

“四位一体”何以可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荆晓丽 孟晓雨 蒋沁怡 郑坚

摘要：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是服务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其高质量发展有赖于稳定有效的多主体协同机制。本文选取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为研究对象，从参与主体、职责分工、协同方式和运行机制等维度开展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四国虽在治理传统与实践路径上各有侧重，但均形成政府统筹、院校实施、企业嵌入、社会组织协同的“四位一体”结构，并以职责明晰与资源互补为基础、目标统一与利益平衡为动力、制度嵌入与规则约束为保障、标准共建与质量共治为持续改进机制。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应强化国家统筹，深化企业和行业组织参与，健全项目协同执行与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标准共建与质量共治体系。

关键词：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机制；国际比较；协同治理；中国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格局的深度调整与国际产能合作的纵深推进，我国正在以产业出海为战略抓手，推动我国全球产业布局向更高层级跃迁。在此进程中，职业教育境外办学作为支撑产业出海的重要人力资本供给机制，既能够为国际产能合作提供本土技能人才保障，又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因而成为我国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支点。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称职业教育境外办学，主要指职业院校、企业及相关组织跨越国界，在境外开展职业教育项目建设、技能培养、专业建设和标准输出等活动。从国际研究视角看，其与跨境教育（cross-border education）、跨国教育（transnational education）等概念存在关联，但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更加突出产业需求、技能培养和产教协同特征，强调教育资源跨境流动与当地产业人才需求之间的结合。

历经十余年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取得显著进展。截至2024年底，全国27个省份的200余所职业院校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办学机构和项目，并成功打造了“鲁班工坊”“中文工坊”“班·墨学院”等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境外办学品牌^[1]。伴随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工作重心从早

*本文系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2025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职业教育服务大国外交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布局体系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ZG202507）的研究成果。

期的规模扩张转向以服务大国外交和国际产能合作并重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国际合作机制”^[2],为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制度创新与效能提升指明了方向。

事实上,职业教育境外办学作为一项跨越国界、涉及多方利益的复杂系统工程,其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高度依赖成熟且有效的多主体协同机制。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虽已初具规模,但在政策支撑力度、专业国际适配度以及区域发展均衡度等方面仍面临现实短板,各参与主体之间缺乏制度化的协同机制,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资源衔接不足、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制约境外办学实践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跃升^[3-4]。因此,破解各异质性主体间的集体行动逻辑、构建一套能够有效整合政府、院校、企业、行业组织等资源的中国特色协同机制,成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职业教育境外办学中的多主体协同机制日益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相关研究呈现明显的兴起之势。国内研究多从微观案例切入,侧重于描述不同境外办学机构与项目的办学模式以及政府、企业、院校、行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职责分工。已有研究尤其关注“鲁班工坊”^[5-7]、“丝路学院”^[8-9]等知名品牌,以共生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视角剖析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以及品牌统筹、产教融合等典型实践模式。^[10-11]相较之下,国外研究则主要沿着宏观与中观两条路径展开。在宏观层面,国外研究主要从跨国技能形成与国际组织参与两条路径考察职业教育国际化:前者以德国技能形成体制为典型,揭示职业教育的跨国延伸并非单纯的教育服务输出,而是受国家制度、产业组织、企业技能需求与跨国经济联系共同塑造的结果^[12];后者聚焦国际组织的作用,指出其通过知识生产、政策议程设置、国际比较与政策转移推动各国职教改革,表明跨国职教合作是政府、国际组织、产业与教育机构等多层级行动者共同参与的政策过程^[13]。^{-13]}在中观层面,研究关注输入国的社会结构、制度兼容性及非教育因素对跨国技能转移的影响,强调境外办学并非简单的复制输出国的教育模式,而是输出国政府和企业、输入国合作院校与行业机构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持续协商的过程,其关键在于推动知识技能在不同制度与文化环境中再情境化^[14-15]。在此基础上,部分研究审视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国际化实践中的权力关系与伙伴结构,围绕政府、企业、院校、社会组织等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网络,剖析协同机制不畅、技能供需错配等制约协同办学效能的突出问题^[16-17]。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学界针对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机制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例如,先前研究侧重于对单一国家的典型案例或实践经验进行微观描述,缺乏

将多个国家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进行系统性的比较研究；多数研究将“协同”视为一种静态结果，而对于各异质性主体在复杂的跨国场域中如何互动、依靠何种规则连接、谁在其中扮演核心驱动角色等动态机制的解析尚显不足。换言之，关于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机制的“黑箱”仍未被完全打开，对于各主体在协同机制中的具体作用及其合作关系的剖析较为薄弱。因此，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涉及政府、院校、企业、行业组织等多元主体，各主体间如何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仍是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

基于此，本文选取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四个在职业教育境外办学领域发展经验丰富且各具特色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其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多主体协同机制，以期为中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机制的构建提供可资参照的国际经验。具体而言，本文将描述和剖析上述国家的政府、职业院校、企业、行业组织等关键主体在职业教育境外办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彼此间形成的协同结构及其联动的制度逻辑。通过对这四个国家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机制的深度剖析与横向比较，本文将揭示不同机制下各主体作用的具体发挥路径，进而为我国构建“政府统筹、院校实施、企业参与、行业组织协同”的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机制（下称“四位一体”结构），提供系统性的借鉴经验。

本文所提出的“四位一体”协同结构，是对“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在跨境办学情境下的具体化延伸。如果说“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主要聚焦产业与教育、企业与院校之间的双边关系，那么“四位一体”则将分析视野拓展至政府、院校、企业、行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机制，更贴合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跨境属性与复杂治理需求。

二、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的国际经验

随着全球产业格局的深度调整与各国外交战略的系统推进，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早已超越单一的教育资源输出，成为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与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不同国家依托各自的治理传统与战略导向，在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多主体协同机制。为系统揭示这些机制的内在规律，本文遵循洲际代表性与机制多样性原则，选取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四国为研究对象，阐明各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机制的形成背景、鲜明特征与实践效果，以期为我国构建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机制提供有益经验。

（一）德国：校企双元、标准锚定的体系化协同

德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多主体协同机制根植于其国内应用成熟的双元制传统，并在联邦政府长期战略统筹下发展而成。双元制确定了企业作为平等办学主体的地位，天然内嵌着多主体协同的运行逻辑。随着德国企业全球化布局

的持续推进，海外分支机构对本土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日益上升，倒逼德国双元制办学模式向境外拓展。2013年7月，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发布首份《联邦政府统一推进国际职业教育合作战略文件》（Strategiepapier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internationalen Berufsbildungszusammenarbeit aus einer Hand），标志着该国国际职业教育合作进入战略化、体系化推进阶段。^[18]此后，德国将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系统性地纳入对外教育、经济发展与发展援助的政策框架。

在过去十余年间，德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发展出“战略驱动为引领、标准输出为核心、深度本土化为支撑”的鲜明特征，构建出一套由“政府统筹战略+行业组织锚定标准+校企双元交替”构成的体系化协同机制，实现了提升教育质量、满足产业发展需求与落实国家外交目标三重目标的深度融合。在这一机制中，政府部门扮演着顶层设计与政策保障的关键角色。德国政府通过《联邦政府国际职业教育合作战略》等纲领性文件，将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整合进国家政策框架^[19]，并通过“国际职业教育合作圆桌会议”实现跨部门协同与职能分工，形成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政策执行体系。其中，联邦教育及研究部侧重于面向合作伙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开展持续性的双边职业教育战略合作；外交部以驻外机构为依托协调信息收集；经济与能源部支持德国海外商会以德国职业教育为样板搭建国际合作平台；而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则致力于开展发展援助框架下的教育合作。作为连接教育与产业的桥梁，德国海外商会、德国工商会等行业组织在协同机制中发挥着标准治理与质量认证的枢纽作用，其职能并非简单的项目支持，而是在标准设定、质量保障与利益协调层面发挥系统性作用。它们通过将德国国内法定的培训条例转化为境外办学项目实施的根本准则，并利用海外商会的全球执行网络开展全流程的质量监控与职业资格认证，推动境外培训参照德国标准并结合输入国具体条件实施，以此捍卫德国职业教育品牌的国际公信力。作为需求端与实践载体的企业，则通过提供真实的实训环境与岗位资源，驱动课程内容紧贴产业实际，并与负责提供教育理念、师资培训及在地化课程体系开发的职业院校共同构成德国双元制模式在海外落地的执行者^[20]。在上面四个因素之外，德国智库承担着开展国别研究与提供适配方案的功能。德国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内设的国际职业教育合作办公室，作为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重要联络与咨询平台，承担着国别研究、政策咨询与合作方案适配等功能^[21-23]。此外，德国国内的各种政治基金会发挥着论坛组织、政策对话与专题研讨等作用。

综上所述，德国在推动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过程中形成的校企双元、标准锚定的体系化协同机制不仅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在境外的有效供给，而且成功将

国内实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延伸至跨国场域，在相关主体间构建起稳定的合作生态，驱动该国职业教育标准和技术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广泛传播。然而，这一机制对输入国的制度基础具有较强依赖，例如企业能否持续参与、行业组织是否具备标准治理能力、职业资格能否获得制度认可都会影响协同成效。在学校本位传统较强或企业培训动力不足的国家，若直接移植德国培训条例与组织形式，容易出现标准在场而机制缺位的形式化移植。因此，德国经验的可借鉴之处主要在于多主体共担、社会伙伴协商与标准治理的制度逻辑，而非具体制度形态的原样复制。

（二）日本：政府统筹、官产学联动的组织化协同

日本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多主体协同机制根源于该国职业教育与产业人才培养领域长期形成的官产学协同传统。^[24-25]作为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日本在产业发展、技能形成和人才培养中长期依赖政府、企业、院校及行业组织之间的制度化合作，这种非市场协调机制为职业教育领域的多主体联动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26]。随着日本企业海外布局和政府开发援助体系的推进，这一官产学协同机制被进一步拓展至境外场域，并通过一些公共性专业机构转化为面向输入国的产业人才培养、技能标准推广和教育模式输出实践，从而为日本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提供较为稳定的制度支撑。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呈现出“政府统筹为引领、官产学联动为路径、公共资源配置为支撑、教育模式与技能标准输出为指向”的鲜明特征，构建出一套“政府统筹资源+企业贡献标准+院校输出转化+社会组织协调支撑”的协同机制，以此推动教育体系与技能标准的双重输出，并服务本国产业海外布局与国家软实力提升。在这一协同机制下，政府部门发挥着战略统筹与公共资源调配的顶层设计功能。其中，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及文部科学省等中央机构根据国家利益需求，将职业教育对外输出深度整合进政府开发援助与产业补贴政策，通过制度保障与资金支持，推动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实现外交、经济与教育三重目标。尤为重要的是，政府在此过程中承担跨部门协调与公共资源配置角色，推动企业、院校与专业机构共同参与人才培养项目，并通过公共项目促进企业技术经验向培训内容转化。此外，政府通过推动专业机构分工协作，为职业教育境外办学项目的实施提供系统支撑。作为日本对外实施政府开发援助的主要执行机构之一，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通过技术合作、人员研修、专家派遣和必要设备支持等方式推动项目实施；而作为日本经济产业省所辖的重要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则发挥行业协调与校企对接作用，为日本企业与海外大学之间的合作提供对接机会^[27-28]。这两个机构共

同发力，确保职业教育境外办学项目在国外有效落地。企业则作为技术标准的供给侧与人才成果的吸纳端，通过参与培养标准形成、提供实训场所、派遣技术专家并承诺吸纳就业，形成强大的就业拉力，从而增强教育体系输出的实践针对性和产业适应性。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与产业之间的重要中介，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发挥需求识别与标准核心定义的功能，精准捕捉海外投资扩张及供应链升级中的人力资源瓶颈，并通过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推动产业需求与外交手段的精准衔接^[29-30]。作为知识与教育体系交付主体的学校，则承担着教育“产品包”的输出与转化功能。以日本宇部高专、函馆高专等院校在越南工业与贸易学院（College Of Industry and Trade）开设的高等专门学校（KOSEN）^[31]模式项目为例，日方院校通过参与课程设计、课堂改进和教师培训，帮助越方院校将 KOSEN 的五年一贯制课程结构、主动学习方法和校企合作机制转化为本土化教学实践^[32-33]。

日本在推动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过程中形成的政府统筹、官产学联动整合资源的组织化协同，不仅有效缓解了跨境办学资金投入大、外交协调难、技术标准分散等现实约束，而且通过政府提供援助、企业贡献标准、院校输出转化、社会组织协调等多主体联动，将原本分散的资源整合为统一的境外办学支撑体系，确保该国职业院校在输出教育体系与技能标准的同时，服务本国产业海外布局和国家软实力提升等多重目标。这种以政府援助和公共专业机构为枢纽的组织化协同也存在着较强的项目依赖性与持续投入压力。一方面，外交合作、产业布局和教育输出等多重目标叠加可能会增加项目目标排序与跨部门资源协调的复杂性；另一方面，KOSEN 模式对一体化课程、专业师资、实训设施及日方专家支持具有较高要求，在输入国制度基础和资源条件不足时，难以实现低成本、快速复制。所以学习日本经验还需要在公共资源整合的同时强化输入国的本土师资与组织能力建设，并建立清晰的退出安排和长期评价机制，以降低境外办学对援助资源和输出国执行主体的持续依赖。

（三）澳大利亚：同标治理、院校品牌的产业化协同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多主体协同机制在该国教育产业化导向的政策组合与国家统一教育标准体系的长期建构双重影响下发展而成。20 世纪 90 年代初，澳大利亚开始在职业教育资金配置中引入市场机制，形成了具有可竞争性、市场化特征的公共资金分配结构，并促使职业技术教育学院（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简称 TAFE）等在监管框架下强化市场响应、品牌经营与多元合作等能力，逐步建立起成熟的职业院校商业化运作模式，为院校品牌的境外拓展和产业化运作奠定基础。1995 年首次引入的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The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作为全国统一的学历资格标准，明确

了各类资格的学习成果与层级要求^[34]，并通过教育质量监管机构将境内教育的合规与质量要求延伸至境外办学场域，成为境内外教育同标治理的根本依托^[35]。

目前，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呈现出“统一标准治理、TAFE 品牌驱动、行业标准牵引”的核心特征，构建出一套“以政府战略统筹与制度监管为引领、以 TAFE 院校课程认证输出与在地化转化为核心、以行业组织标准开发与产教融合为驱动、以非营利组织平台搭建与国际网络拓展为支撑”的产业化协同机制，在短期内推动教育出口增长，在长期内服务国家外交布局、国际产能合作与教育国际影响力提升等多维目标。在这一协同机制中，澳大利亚政府部门承担战略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的双重功能。联邦政府通过《澳大利亚国际教育战略 2025》（National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5）、《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参与战略 2025》（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Strategy 2025）等纲领性文件，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际参与，以提升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国际声誉并促进可持续增长^[36]。与此同时，基于联邦制下“中央统筹、地方执行”的治理逻辑，各州及领地政府通过制定差异化的国际教育战略、派驻海外贸易代表团及教育专员，推动公共外交与市场推广协同联动。作为微观层面的战略执行主体，以 TAFE 学院为代表的职业院校肩负知识体系交付与文化价值传播的双重使命。它们在传授知识与技能的同时，也输出澳大利亚的教育理念和工作文化。更为重要的是，澳大利亚职业院校通过输出高质量的课程包与技能认证体系，并将其转化为符合当地产业需求的在地化实践^[37]，有力推动了本国职业教育模式与质量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复制与传播^[38]。在推动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过程中，就业与技能委员会（Jobs and Skills Councils）等行业组织发挥着标准输出与产教融合的驱动性作用^[39-40]。通过主导开发具有全球一致性的“培训包”（Training Package），这些行业组织确保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人才培养成果与劳动力市场动态对接，并保障了西斯尔等跨国企业在海外扩张中的人力资源需求。此外，澳大利亚 TAFE 学院董事委员会等非营利组织扮演着平台搭建与网络拓展的“桥梁”角色，通过与世界理工学院联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等机构开展广泛合作^[41-44]，构建覆盖全球的国际合作网络，持续提升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在全球的品牌影响力。

澳大利亚通过政府战略引领、行业标准驱动、院校课程输出与非营利组织网络支撑的多主体协同机制，实现了该国资格标准、课程体系与教育品牌的系统化输出。这一协同机制不仅凭借“培训包”的统一标准确保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规范性与可复制性，更通过产教深度耦合使其人才培养成果与

跨国企业的海外用人需求精准对接，同时借助全球品牌推广与在地化转化，实现标准扩散、品牌传播与国家影响力提升的有机统一。但以统一标准和院校品牌为基础的产业化扩张也伴随跨境质量监管与本土适配风险。境外项目较容易依赖当地合作机构承担部分教学与评价任务，监管距离、制度差异和第三方合作增加了过程监督难度。同时，若过度强调“培训包”的一致性，课程与评价可能难以充分回应输入国的文化规范、产业结构和就业制度。因此，澳大利亚经验的有效性建立在统一标准、严格监管与适度本土化之间的动态平衡之上，不能将境内外同标简单理解为教学内容和实施方式的同质复制。

（四）美国：外交嵌入、规则认证的市场化协同

美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多主体协同机制并非教育输出的自然延伸，而是在全球战略、经济扩张与教育输出需求的多重驱动下形成的系统性实践。二战后，美国政府长期将教育合作纳入对外援助框架，为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提供了方向引导和政策支撑。21世纪以来，伴随软实力竞争的加剧和国际教育战略地位的上升，美国将外交战略深度嵌入职业教育境外办学，使其制度性地融入全球战略布局。由此，职业教育境外办学从单纯的人才培养上升为服务外交布局、输出制度规则、增强国家影响力的战略工具。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扩张催生了大量本土技术劳动力需求。美国跨国企业为降低运营成本并确保技术一致性，积极推动美式行业标准的跨国转移。此外，美国国内成熟的教学体系与行业协会推动的能力标准化，也为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深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上述动力的共同驱动下，美国逐步形成了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多主体协同推进的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机制。

目前，美国的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呈现出“外交战略嵌入、产教融合联动、规则标准认证”的核心特征，构建出一套“联邦政府引导+企业核心驱动+院校自主实施+行业组织标准支撑”的产教融合协同机制，由此实现了市场化运作与地缘政治目标的有机结合。在这一协同机制中，美国联邦政府发挥着战略统筹与援助资源配置的顶层设计功能。美国教育部及其职业、技术与成人教育办公室依据《卡尔·D·珀金斯职业技术教育法》（Carl D. Perkins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ct）等法规确定政策框架，授权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对外援助执行机构将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深度整合进“制造业回流”与“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等国家安全与外交愿景，以此实现援助资源与经济和外交战略目标的对接。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职业教育境外办学项目的直接引导者和支持者，通过将境外办学成效与地方发展计划、经济需求挂钩，确保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标准与国内教育质量保持一致。作为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实施主体，社区学院与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提供涵盖完整课程资源与实训方案的职业教育课程包，输

出本国的教育教学体系，并借助师资能力建设实现教育理念的在地化迁移，帮助当地教师掌握美国基于能力的培训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区学院与职业技术学院并不只是承担联邦政府对外援助项目的末端执行任务，而是在联邦政策框架、援助项目资金和行业标准体系的支持下，依托美国教育治理中较强的州地分权传统与院校办学自主权，主动开展境外合作项目设计、课程体系开发、合作伙伴选择、师资能力建设与在地化转化等工作^[45-48]。跨国企业是美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体系的“核心驱动力”，其海外业务需求与该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战略导向直接相关。跨国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技能培训中心、提供实训设备以及深度参与课程设计咨询，将自身盈利动机转化为推动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实质性资源投入，并依托“培训-认证-就业”的闭环机制形成强大的就业拉力。与此同时，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发挥着标准认证与桥梁沟通的关键作用。例如，美国国家标准学会通过协调美国自愿性标准体系、认可标准制定程序并代表美国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为美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化体系的衔接提供制度支持^[49]；美国焊接学会认证、汽车服务卓越认证等行业认证则由相关专业机构分别实施。此外，美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是美国职业与技术教育领域的重要专业协会，主要通过政策倡导、专业发展和资源服务推动本国职业与技术教育发展^[50]；在境外技能发展实践中，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则通过具体援助项目支持职业培训与劳动力发展^[51-52]。

尽管在实践中面临输入国文化背景与产业结构差异带来的本土化挑战，美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所构建的外交战略嵌入、规则标准认证的市场化协同机制通过政府提供援助资源、校企协同开发课程与培训方案以及行业组织的补充支持，在政府、企业与教育机构之间形成稳定的合作生态。这一协同机制不仅有助于美国职业教育的在全球树立领导地位，更驱动了该国技术标准与价值影响力的跨国传播，在服务地缘政治战略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全球产业链治理中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市场化、分权化与援助项目化也使其面临协同欠缺和项目可持续性不足的风险。联邦政府、州地机构、院校、企业及项目承包机构之间权责相对分散，项目成效容易受到资金周期、执行机构能力与绩效监督质量的影响；企业主导的培养标准也可能更偏向特定企业的即时用工需求，而难以充分支撑输入国长期公共技能体系建设。因此，企业和市场可以增强协同活力，但仍需以稳定的公共治理、透明的绩效评价和本土制度能力建设加以校正，避免境外办学退化为短周期援助项目或企业专属培训。

三、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机制的生成逻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尽管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四个国家在治理传统、战略导向、协同方式、实践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它们在推动职业教

育境外办学的过程中普遍超越单一主体办学的局限，通过制度化手段整合政府、学校、企业及行业组织等多方力量，优化配置不同主体在教育、资金、标准等方面的资源，构建起权责清晰、优势互补、目标一致的办学共同体，实现教育、人才、产能的协同增效。这种跨部门、跨领域的多主体协同机制不仅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功能互补，降低了跨境办学中的制度不确定性，弥补了院校在资金、设备、师资、实训场景和质量保障等方面的资源不足，而且有效提升了这些国家职业教育标准和体系的国际影响力，强化了这些国家在国际技能分工中的制度话语权。

（一）职责明晰与资源互补是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机制构建的基础

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四个国家推进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的经验表明，不同主体之间职责明晰与资源互补是多主体协同机制构建的基础，决定着协同能否真正落地、办学能否持续见效。这些国家正是基于这一基础，构建起多主体协同机制，形成推动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发展的合力。在协同机制构建过程中，各主体分工明确、资源互补：政府主要承担战略规划、制度供给、资源协调与跨部门统筹等职责；院校负责课程开发、教学实施、师资培养与本土化转化等任务；企业提供技能需求、实训场景、技术标准与就业吸纳支持；行业组织及专业机构则承担标准制定、质量认证、平台搭建与利益协调等功能。在具体运作上，虽然不同国家推动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的方式有所不同，例如日本以政府统筹和公共资源整合为牵引，德国以行业组织标准治理和质量认证为枢纽，澳大利亚则以统一资格标准治理和 TAFE 院校课程品牌输出为抓手，但它们本质上均是通过核心主体引领，在职责明晰与资源互补的基础上，构建起多主体协同机制，将政策、标准、课程、设备、认证与市场等资源有效整合。各主体职责分工不同、资源禀赋各异，由此形成的互补优势使其能够在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过程中，在战略统筹、质量治理、品牌传播与产教衔接等方面发挥协同效应，最终实现资源整合与协同增效。

（二）目标统一与利益平衡是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机制持续运行的关键

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四个国家在推进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不同主体之间目标一致与利益平衡是多主体协同机制持续运行的关键，决定协同能否持续深化、办学能否行稳致远。在目标统一方面，各国注重实现宏观层面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合作目标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海外扩张需求、产业项目实施目标、院校评估指标等子目标的协同统一，确保不同主体能够按照共同目标和各自职责推进各项工作。在利益平衡方面，各国普遍将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纳入国家对外战略与产业政策框架，并通过立法保障、财政激励、

信息共享等制度工具，协调政府、企业、院校与行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有效减少因利益冲突引发的协同内耗。虽然这四个国家的战略目标和协同机制不同，例如日本以政府开发援助和公共资源配置为牵引，统筹政府、企业与院校资源；美国通过政府战略引导与企业需求驱动，将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嵌入外交战略和产业布局；德国依托海外商会、工商会等行业组织，加强职业标准、资格认证与教育供给之间的衔接；澳大利亚则借助国家资格框架、行业培训包和质量监管体系，推动教育标准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但其本质均是通过目标统一与利益平衡的双重机制，使不同主体的行动方向趋于一致。各主体在战略目标上高度统一、在利益诉求上相互兼容，这使其能够在持续协同中减少内耗、凝聚合力，从而显著提升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整体效能。

（三）制度嵌入与规则约束是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机制稳定运行的根本保障

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四国推进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的实践表明，制度嵌入与规则约束是多主体协同机制稳定运行的根本保障。在制度嵌入方面，各国并非依赖临时性合作或个别项目推动，而是通过法律法规、政府文件、项目协议、注册监管和资助规则等制度安排，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边界、协作流程与实施要求；在规则约束方面，各国则依托职业标准、资格认证、过程评估、质量监管和反馈改进机制，对境外办学项目的课程实施、实训过程、认证结果和合作成效进行持续校准与动态规制，由此维护多主体协同机制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在具体运作上，虽然四个国家推动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的方式有所不同，例如德国依靠法律授权和行业认证体系强化标准约束，澳大利亚借助统一资格框架和质量监管体系实现境内外同标治理，美国通过政策法规、援助体系与行业认证推动职业教育境外办学与国家战略、产业需求相衔接，但本质上均是通过制度嵌入与规则约束，将各主体权责、协作流程、质量监督纳入制度化轨道，从而构建起稳定运行的多主体协同机制。正是得益于这些制度嵌入与规则约束，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机制才能够在刚性框架下持续稳定运转，有效降低协作中的不确定性与冲突风险，最终提升境外办学的整体稳定性与长期可持续性。

（四）标准共建与质量共治是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持续改进的核心支撑

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四个国家在推进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标准共建与质量共治是多主体协同机制持续改进的核心支撑。教育质量保障并不只是院校内部的管理问题，而是政府、行业组织、企业、院校、监管机构及研究机构等多元主体围绕标准、过程、评价与反馈所形成的协同治

理过程。在具体做法上，德国以政府的战略统筹和制度供给为基础，以海外商会、工商会等行业组织的标准治理和资格认证为核心，以企业对岗位能力和实践标准的持续输入为支撑，以院校对课程实施和本土化转化的具体落实为载体，并辅之以智库对国别适配和方案优化的专业支持，形成多主体联动的质量保障体系；澳大利亚的做法则进一步体现出行业参与、国家监管与数据支撑相结合的质量治理特征，即由行业组织将技能需求嵌入培训标准开发过程，由监管机构实施外部质量监督，由研究机构通过持续的数据采集与分析为政策调整和质量改进提供依据。各主体在质量保障中分别承担标准制定、过程实施、评价监督与反馈改进等不同职能，这些职能使其能够在境外办学进程中依托协同治理机制形成闭环，从而实现教育质量的持续改进。

四、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主体协同的实践路径

近十余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取得显著进展，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合作类型日益丰富，在支撑企业“走出去”和促进输入国本土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与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已经形成较为成熟多主体协同机制的国家相比，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在多主体协同能力建设方面仍处于持续探索和逐步完善阶段，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与跨部门统筹协调仍需加强，常态化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政策衔接与资源配置的协同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企业及行业组织的参与深度仍显不足，目前主要集中于项目支持层面，在标准制定、课程开发与质量治理等关键环节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三是项目协同运行机制尚不健全，稳定的协同执行与动态调整机制仍有待完善，不同主体之间的任务衔接和过程协同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四是质量保障体系支撑仍需完善，标准共建与质量共治尚处于建设阶段，导致教育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提升受限^[4,10,53]。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服务大国外交和国际产能合作的能力。在此背景下，构建统筹主体明确、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机制，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从项目化推进走向体系化运作、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提升的重要一步。

（一）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破解跨部门协同欠缺问题

职业教育境外办学作为一项涉及教育、外交、商务、行业管理等多领域的系统性工程，其推进不能依赖单一部门，而亟需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近年来，我国教育部门围绕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需求，在政策规划和制度建设方面作出积极部署，为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仍然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设计与跨部门的统筹协调，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政策支持也相对不足，顶层设

计有待进一步完善^[53]。为破解跨部门协同欠缺的问题，我国应在国家层面建立常态化的协同推进机制：在横向上，依托部际联席机制或专项工作机制，构建跨部门协同议事与执行平台，明确教育、外交、商务及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协同边界与工作流程，并以任务清单、权责清单和项目清单推动协同事项落地；在纵向上，建立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统一申报-分类管理-过程监管-成效评估”闭环管理机制，减少碎片化推进与重复建设，推动地方政府与行业主管部门在重点国别、重点产业上形成国家统筹、地方执行、企业与院校联动的分层治理结构，从而提升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整体供给能力和政策稳定性。

（二）深化企业和行业组织嵌入，破解多主体参与表层化问题

国际经验表明，企业和行业组织只有在职业标准、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中拥有实质性话语权，才能真正将产业需求转化为教育供给。然而，就我国现实而言，当前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企业和行业组织缺乏积极参与境外办学的信息沟通平台和利益共享机制^[4,53-54]；另一方面，校企协同“走出去”共同体建设中存在主体角色功能薄弱、制度文化环境缺位等障碍，导致协同关系碎片化、稳定性不足^[10]。上述问题的实质是企业和行业组织在职业教育境外办学中的嵌入程度不足，参与多停留于表层。为破解这一困境，我国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化嵌入机制：第一，围绕企业海外布局与属地化用工需求，建立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增强企业持续参与的内生动力，使企业真正成为办学主体而非旁观者；第二，推动职业院校从课程、师资等要素输出转向能力体系、标准体系和认证体系的整体输出，探索形成“标准—平台—认证—培训”一体化的境外办学新模式，提升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第三，推动行业协会由“旁观者”转变为“质量监控枢纽”，强化其在职业标准共建、过程监督、第三方评价及认证衔接等方面的协调作用，从而提升多主体协同治理效能。

（三）健全项目协同执行与动态调整机制，破解境外办学运行分散化问题

多主体协同能否真正落地，不仅依赖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更取决于项目实施阶段是否建立了制度化、契约化的协同执行与动态调整机制。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存在办学定位不够清晰、校企协同机制尚未健全等问题^[4,10]，导致多主体在培养目标、任务分工与资源投入上难以保持一致，进而引发“各干各的、各算各的”的目标分化与行动偏差，具体表现为项目运行分散、任务衔接不畅、过程反馈滞后等运行分散化问题。为破解上述问题，我国应从制度嵌入与规则约束入手，将项目协同执行纳入刚性制度框架。第一，建立法律授权与政府间协议为基础的制度嵌入机制。推动我国与输入国签订双边教育合作协议或备忘录，明确境外办学项目的法律地位、各方权责及争议解决途径。在

项目层面，要求牵头院校、企业、行业组织及输入国合作方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多方合作协议，细化利益分配、风险分担、责任追究及退出机制，从源头上减少协同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第二，完善规则约束下的全过程动态调整机制。由国家主管部门制定境外办学项目管理的强制性规范，涵盖立项审批、年度报告、质量审计、风险预警等环节。与此同时，依托数字化监管平台，建立跨主体共享的信息管理系统，对项目进度、教学质量、岗位匹配和合作成效进行实时监测，并设置量化指标与定期通报制度。第三，强化刚性约束与柔性调整的结合。在保持规则刚性的前提下，根据输入国产业政策变化、企业用人需求波动等外部环境变动，设置规范的调整程序（例如协议修订条款、预案启动机制），使动态调整有章可循，避免主观随意。通过上述制度嵌入与规则约束，将协同从宏观的“机制设计”延伸至项目层面的“执行闭环”，真正破解境外办学运行分散化问题，提升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运行效率、稳定性和长期可持续性。

（四）完善标准共建与质量共治机制，破解质量保障体系支撑弱化问题

从国际实践看，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经验丰富的国家普遍将质量保障嵌入境外办学制度设计之中，特别是通过标准共建与质量共治支撑办学质量提升和项目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已围绕境外办学开展了一系列制度建设与政策引导工作，例如出台《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发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等，为职业院校规范推进境外办学提供了基本遵循。然而，当前我国境外教育质量监管和认证体系仍存在明显短板，突出表现在标准共建机制缺失、质量共治不足等方面。国家层面对职业院校境外办学的规范与保障不足，不仅制约境外办学的质量提升，而且可能损害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声誉^[4]。为健全标准共建与质量共治机制，破解质量保障体系支撑弱化问题，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建立多方参与、产业驱动的标准共建机制。我国应推动政府、行业组织、企业、院校等主体共同参与境外办学相关标准的制定。具体而言，由行业组织牵头，联合跨国企业和输入国合作方，围绕海外岗位能力要求，开发具有国际可比性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和考核标准；同时，建立标准动态更新机制，根据产业技术变革和输入国人才需求变化，定期修订完善，确保标准的前沿性与适应性。此外，应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与国际通用标准的对接与互认，增强标准输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构建全流程协同、数据驱动的质量共治体系。我国应建立覆盖“培养目标制定-课程实施-实训考核-就业跟踪”全过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在职能分工上，政府负责构建质量保障框架与监管体系，院校承担教学实施与内部质量改进任务，行业组织提供第三方评价与认证服务，企业参与实训环节的评价与毕业生就业反馈。同时，

我国应建立境外办学质量信息共享系统，推动各方对教学运行、师资配置、就业质量等关键指标进行实时监测与定期评估，并通过“培养-就业-反馈-改进”的数据闭环，反向驱动培养方案与标准内容持续优化，使质量共治真正成为办学质量持续提升的核心支撑。

（荆晓丽，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5；孟晓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科研助理，北京 100875；蒋沁怡，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郑坚，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北京 100000）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锚定中国教育的全球坐标 回眸 2024·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 扎实迈进 系列述评之五 [EB/OL]. (2025-01-11)[2026-07-21]. https://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2025/2025_zt01/zsmj/202501/t20250111_1175209.html.
- [2]中共中央,国务院.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Z]. 2025.
- [3]段晗晗.“职业教育境外办学 背景下职业院校境外办学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J]. 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学报,2025,34(4):61-68.
- [4]刘聪,阮晓文,何正英. 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特征事实、现实问题及路径优化[J]. 中国高教研究,2025,41(5):93-100.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5.05.12.
- [5]王岚. 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国际话语权研究 以全球 鲁班工坊 为例[J]. 教育发展研究,2025,45(3):26-36.
- [6]王岚. 全球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复合体研究 以 鲁班工坊 为例[J]. 高教发展与评估,2025,41(5):66-76,132.
- [7]曾凤琴,庞学光,张春晓,等. 打造职业教育的国际品牌 对鲁班工坊建设的回顾与前瞻性思考[J]. 教育发展研究,2022,42(23):45-53.
- [8]包茜,方义桂.“职业教育境外办学 战略下宁波丝路学院 一带一路 教育共同体构建路径[J]. 现代职业教育,2026(1):13-16.
- [9]杨义波,喻宙. 电力丝路学院服务 一带一路 的内涵、模式与路径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34):89-95.
- [10]侯佳,孔令帅. 共生理论视角下高职校企协同 走出去 办学共同体的构建[J]. 中国高教研究,2025,41(5):101-107.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5.05.13.
- [11]刘晓,康梦云.“职业教育境外办学 的时代意蕴、模式选择与实践进路[J]. 现代教育管理,2025(6):112-120. DOI:10.16697/j.1674-5485.2025.06.011.
- [12]IVARDI C, WANKLIN L. Growing through skills: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into growth regimes[J]. Socio-Economic Review,2025,23(4):2253-2318. DOI:10.1093/ser/mwaf023.
- [13]KLASSEN J.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 Training,2025,77(3):792-818. DOI:10.1080/13636820.2024.2320895.
- [14]TOEPPER M, ZLATKIN-TROITSCHANSKAIA O, KÜHLING-THEES C.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2021,8(4):138-169. DOI:10.13152/IJRVET.8.4.7.
- [15]ZLATKIN-TROITSCHANSKAIA O, et al.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dvances and developm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2022,26(1):1-10. DOI:10.1111/ijtd.12292.
- [16]SEMALI L. Leveraging 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s in techni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J]. Vocation, Technology & Education,2024,1(1):e3. DOI:10.54844/vte.2024.0558.
- [17]NGO S. The social rol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decolonisation[J]. 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 Training,2025,77(1):229-248. DOI:10.1080/13636820.2024.2384032.
- [18]BUNDESREGIERUNG. Strategiepapier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internationalen Berufsbildungszusammenarbeit aus einer Hand: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7/14352[R/OL].

- (2013-07-05)[2026-07-18]. <https://dserver.bundestag.de/btd/17/143/1714352.pdf>.
- [19]BUNDESREGIERUNG. Strategie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internationalen Berufsbildungszusammenarbeit aus einer Hand[EB/OL]. (2019-05-22)[2025-11-10]. https://www.govet.international/dokumente/pdf/Strategie_der_Bundesregierung_iBBZ_2019.pdf.
- [20]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DIHK). Du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broad[EB/OL]. [2026-07-21]. <https://www.dihk.de/en/dual-vocational-education-and-training-abroad-174396>.
- [21]GOVET. The political strategy[EB/OL]. [2026-07-21]. <https://www.govet.international/en/2351.php>.
- [22]GOVET. Round Table for inter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operation[EB/OL]. [2026-07-21]. <https://www.govet.international/en/2353.php>.
- [23]GOVET. Our advisory service[EB/OL]. [2026-07-21]. <https://www.govet.international/en/39995.php>.
- [24]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JAPAN (MEXT). Development of highly skilled human resources in industry-academia cooperation[EB/OL]. [2026-07-21]. <https://www.mext.go.jp/en/policy/education/highered/title02/detail02/1373920.html>.
- [25]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JAPAN (MEXT). Promotion of industry-academic-government cooperation[EB/OL]. [2026-07-21]. https://www.mext.go.jp/en/policy/science_technology/policy/title01/detail01/1374034.htm.
- [26]HALL P A, SOSKICE 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 [27]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jects[EB/OL]. [2026-07-21]. https://www.jica.go.jp/english/our_work/types_of_assistance/tech/projects/index.html.
- [28]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JETRO overseas university connection desk[EB/OL]. [2026-07-21]. https://www.jetro.go.jp/services/connection_desk.html.
- [29]JAPAN BUSINESS FEDERATION (KEIDANRE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sts through partnerships between industry, academia, and government[EB/OL]. (2003-03-18)[2026-07-21]. <https://www.keidanren.or.jp/english/policy/2003/024.html>.
- [30]JAPAN BUSINESS FEDERATION (KEIDANREN). Requests for the new administration[EB/OL]. (2012-12-26)[2026-07-21]. <https://www.keidanren.or.jp/en/policy/2012/091.html>.
- [31]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JAPAN (MEXT). Introduction of the KOSEN engineering education model into higher education in Mongolia, Thailand and Vietnam[EB/OL]. (2017-02-23)[2026-07-21]. <https://www.eduport.mext.go.jp/en/journal/project-en/mongolia-thailand-vietnam-kosen-k-2/>.
- [32]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APAN. The 4th National College of Technology Model Committee Meeting (in cooperation with Vietnam) was held in Tokyo[EB/OL]. (2024-03-11)[2026-07-21]. <https://www.kosen-k.go.jp/en/news/10046>.
- [33]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BE COLLEGE. Ube KOSEN provided faculty training for Vietnam College of Industry[EB/OL]. (2020-04-01)[2026-07-21]. <https://www.ube-k.ac.jp/en/topics/20200217-21-2/>.
- [34]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QF). What is the AQF[EB/OL]. [2026-

07-21]. <https://www.aqf.edu.au/about/what-aqf>.

[35]AUSTRALIAN SKILLS QUALITY AUTHORITY (ASQA). Regulating offshore delivery of VET: ASQA's 2015 pilo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program[EB/OL]. (2016-07-13)[2026-03-14]. <https://www.asqa.gov.au/resources/publications/regulating-offshore-delivery-vet-asqas-2015-pilot-audit-program>.

[36]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VET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Strategy 2025[EB/OL]. (2019-12-05)[2026-07-21]. <https://www.dewr.gov.au/international-skills-engagement/resources/vocational-education-and-training-international-engagement-strategy-2025>.

[37]TRAN L T, DEMPSEY K,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M].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7.

[38]杨姝,许姗姗,李健.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比较与借鉴[J]. 职业教育,2023,22(30):64-69.

[39]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Jobs and Skills Councils[EB/OL]. [2026-07-21]. <https://www.dewr.gov.au/skills-reform/jobs-and-skills-councils>.

[40]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Training Package Assurance[EB/OL]. [2026-07-21]. <https://www.dewr.gov.au/training-package-assurance>.

[41]TAFE DIRECTORS AUSTRALIA. International[EB/OL]. [2026-07-21]. <https://tda.edu.au/policy/international/>.

[42]TAFE DIRECTORS AUSTRALIA. Partnerships and projects[EB/OL]. [2026-07-21]. <https://tda.edu.au/policy/international/partnerships-and-projects/>.

[43]TAFE DIRECTORS AUSTRALIA. WFCP: World Federation of Colleges and Polytechnics[EB/OL]. [2026-07-21]. <https://tda.edu.au/policy/international/wfcf-world-federation-of-colleges-and-polytechnics/>.

[44]TAFE DIRECTORS AUSTRALIA. Annual report 2011[R/OL]. [2026-07-21]. https://tda.edu.au/wp-content/uploads/2019/annual_reports/TDA-Annual_Report_2011.pdf.

[45]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ederal role in education[EB/OL]. [2026-07-21]. <https://www.ed.gov/about/ed-overview/federal-role-in-education>.

[46]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hat is not part of ED's role?[EB/OL]. [2026-07-21]. <https://www.ed.gov/about/ed-overview/overview-of-us-department-of-education-what-not-part-of-eds-role>.

[47]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erkins V[EB/OL]. [2026-07-21]. <https://www.ed.gov/adult-programs/adult-education-laws-and-policy/perkins-v>.

[48]USAID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Audit of USAID/West Bank and Gaza's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R/OL]. (2011-03-22)[2026-07-21]. <https://oig.usaid.gov/node/971>.

[49]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on standardization[EB/OL]. [2026-07-21]. <https://www.ansi.org/standards-faqs>.

[50]ASSOCIATION FOR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CTE). About ACTE[EB/OL]. [2026-07-21]. <https://www.acteonline.org/about/>.

[51]USAID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Financial audit of Aman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Training's management of the Karachi Youth Workforce Development Project in Pakistan[R/OL].

(2019-07-24)[2026-07-21]. <https://oig.usaid.gov/node/2426>.

[52]USAID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Audit of the Forsah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 Activity in West Bank and Gaza[R/OL]. (2025-03-13)[2026-07-21]. <https://oig.usaid.gov/node/7578>.

[53]马玉霞,王传礼,王新.“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随企出海”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J]. 教育与职业,2025(14):57-64.

[54]张慧波,祝蕾.“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实践探索与思考——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 职教论坛,2018(2):125-130.

Coordinating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Enterpris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Overseas Provis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Approach

JING Xiaoli¹ MENG Xiaoyu¹ JIANG Qinyi¹ ZHENG Jian²

(1.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 *Center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000*)

Abstract: The overseas provis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advancing high-level educational opening-up and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epends on a stable and effective multi-actor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is study selects Germany, Japa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comparative cases and examines their practices across four dimensions: participating actors,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modes of coordination,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espite differences in governance tradi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all four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an integrated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i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 embedded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se systems are underpinned by clearly defined responsibilities and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driven by shared objectives and balanced interests, safeguarded through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and regulatory constraint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rough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standards and collaborative quality governance. Drawing on thes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national-level coordination, deepen th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industry organizations, establish more effective mechanisms for collaborativ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dynamic adjustment, and improve the system for jointly developing standards and governing quality.

Key words: overseas provis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multi-actor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hina's approach